

# “知识分子”马丁·雅克

中国读者认识马丁·雅克是因为他的一本书。

2009年6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在英国出版,作者、《卫报》专栏作家马丁·雅克名声大噪。9月,该书在美国发行后,不仅登上了《纽约时报》等英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一年内,也很快被翻译成十几种其他语言。翌年,该书的中文版面世,在国内受到了广泛关注。面对好评如潮和恶贬如雨,2012年8月,雅克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增加了300多页资料,副标题改为“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建立”(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再度受到热议。一周前的邮件中,雅克告诉记者,第二版已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日语等语言,中文版计划明年出版。

其实,近年来撰写中国问题的学者并不在少数。然而,和提出“北京共识”的《时代周刊》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长期关注中国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都不同,马丁·雅克不仅是知名媒体人,也是学院出身的学者。不过,从他的整个关注和研究的视角看来,他更是一个始终坚守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

## 不囿书斋,关注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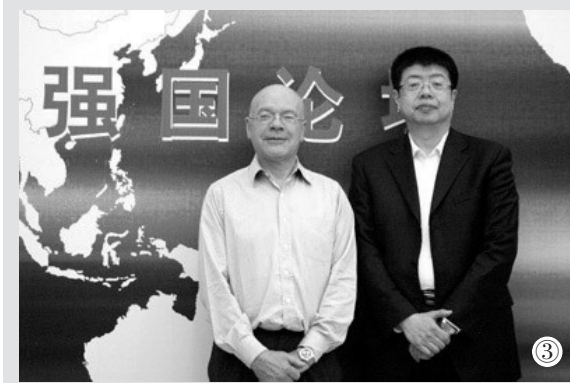
马丁·雅克关注中国和东亚,出自他“知行合一”的观念。

马丁·雅克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考文垂,在那里长大成人。之后在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专业以一等奖学金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进入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曾学过经济,也修过数学,这为他储备了良好的知识结构。值得一提的是,考文垂和曼彻斯特都是英国传统的工业城市,两地的政治长期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这或许也影响了年轻时的雅克。博士毕业之后,他又在布里斯托大学经济与社会史系取得了教职。尽管身后是如此优秀的教育背景,但他并没有囿于学者这一身份,不久他就走出了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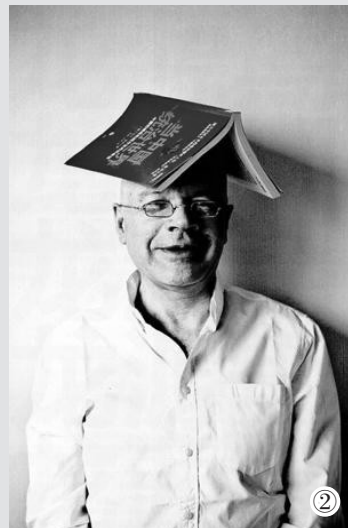
从1977年起,32岁的他开始担任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党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主编。该刊在当年相当有影响力,引导着当时大不列颠共产党的理论风向。1991年,在苏联解体、东欧裂变的国际背景下,大不列颠共产党宣告解体,该刊也停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而是继续在媒体上探索。他开始为《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报刊撰写专栏,并为BBC主持和制作电视节目。期间,还曾位居《独立报》的副主编。

今天的他,依旧精力充沛,难见67岁的痕迹。不仅仍然作为专栏作家活动在《卫报》、《新政治家》等主流西方媒体上来发挥公共影响力,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他也曾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一些高校里担任访问学者,举行讲座和研讨班。他所关心的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在他的印度裔妻子哈林德于一次延误治疗中逝世以后,他认定这次不幸是由于种族歧视,为此与医院方面打了十年的官司。最终获得胜诉后,他并不为此感到快乐,他说“我想要的只是公平”。这个公平,指的已不仅仅是发生在雅克身上的个案,更是仍旧出现在当代社会中的种族主义。雅克说自己作为白人从未经历过种族歧视,过去也未曾去关注这一问题,但哈林德曾经的经历乃至最后的不幸病逝让他意识到,在人类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是一种多么丑恶的罪行。他多番在媒体上发表批驳种族主义的文章,痛斥这一罪恶现象。他还成立了以妻子之名命名的基金会,以帮助她家乡的印度裔孩子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雅克也许并不是一流理论家,但无论作为媒体人还是学者,他的着眼点都在于用实践来改造世界,而不是窝在书斋中。他始终探索寻找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而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求。于是,有着几千



- 1, 在印度旅游、访学
- 2, 马丁·雅克和他的中文版《当中国统治世界》
- 3, 和北大教授张颐武在强国论坛
- 4, 与儿子拉维在一起



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逐渐成了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对象。

## 抨击当局,反思西方

对于中国崛起的思考,源自马丁·雅克长久的对西方的反思。

雅克最早出名,就是凭借着《今日马克思主义》。该刊在1980年代相当有影响力,包括左派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内的学者,都以此为阵地发表文章,并且以此刊物为核心形成了欧洲共产主义派。该刊物严词抨击当时撒切尔政府,认为保守党的一系列政策加大了社会不公,并用“新时代”理论解构了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加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撒切尔主义一词正是雅克与他该刊的同事们所创。此间,他也参与撰写了一系列的左派书籍:《劳动向前迈出的步伐停止了?》(1981年)、《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年)和《新时代》(1989年)。

雅克不仅对保守党政府多有批评,对于工党政府的许多政策,他也认为无非是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冷炙。近年来,他也时常发表评论指出布莱尔时期工党政府的一系列弊病,认为工党早已向新自由主义投降,俨然不再具有以前的改革精神了。

此外,他关心的也不止是英国国内的情况。他在贝卢斯科尼甫一上台时就指出,此人的右翼倾向将使意大利走向混乱,并且由此带坏整个欧洲。意大利的民主将只是表象,实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纳粹。他也指出,当前世界的经济危机并非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其根源在于冷战之后的三十年里,当今世界商界与政界的精英大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过分注重个人利益和自由市场,从而使得包括英国政界在内的西方政治都陷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危机。

对于雅克而言,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政府,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都缺乏良策;而民主在实践中遭到的问题,也让他反思,西方式的民主是否真正具有普适性,人类是否真的能够在这一制度下获得平等,西方模式是否真的是唯一正确的政治

价值。他对于当政者的批驳用词严厉而精准,既有冲击力又一针见血。对于当政当局的不妥协,也体现了他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一贯追求,为争取真正的社会公正而奋斗。而在1993年的东亚之行中,他找到了理论上的突破口。

## 以中为鉴,警醒同胞

对中国力量的正视,来自马丁·雅克对中国实地的研究。

在1993年,因为寻常的一次两周半的休假,他首次来到东亚旅行。在中国,他来到了广东,一切“嗡嗡作响”,他说,英文中是“蒸蒸日上”的意思,这令他尤为震惊。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之后他又多次造访东亚,早在1996年他就有了撰写中国的书籍的念头。1998年,他和书商签约,携妻子和仅九周大的儿子寓居香港,开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999年,他分别在北京、上海、台北居住一个月作调查,然而,2000年1月由于妻子的亡故,使他伤心欲绝而不得不搁笔,等到他在爱子的陪伴下重新振作之后,2005年,他又在爱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里进一步研究,以求深度探寻中国文化,来解码中国崛起的秘密。

在他的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明国家”(civilisation state)。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环境中形成的民族国家而言的。最早做出这种区分的是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而雅克运用并深化了这一区分,他不仅认同白鲁恂的观点,认为中国属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下诞生的民族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体,而且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诸如“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之类的误解,是因为大多数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不明白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理解中国的国情。在他看来,西方人批驳中国、不看好中国的原因在于,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西方尺度来衡量中国。

而雅克绝不是这样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不同于大多数的欧洲人,他眼界开阔,知识面广。去年

奥运会期间,文汇报记者赵博在他伦敦的家中采访了他。他家中的摆设可谓“中西合璧”,墙上挂着京剧脸谱,电视柜上摆着中式雕花,火炉上还摆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留念证书。他还为记者斟上了绿茶,告诉记者第二遍水才可以品用。而此时房间里播放的是巴赫的音乐。他也让他的爱子拉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 打破偏见,传播平等

由中国式价值带来的传播,让马丁·雅克不断地“言说”。

对雅克来说,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美国也不过是在走当年大英帝国衰落的老路。“这一点,作为1940年代出生者,我很有资格和体会谈论大英帝国的衰弱和它的应对策略。”马丁·雅克在一周前给文汇报记者的邮件中谈道。在雅克看来,美国抱着优越感,以为自己依然是世界的中心,可以用自己的标准来指导其他国家,然而他们如此的傲慢必然导致他们的无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里就已经指出,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在20世纪逐渐走向了封闭,变成了妄自尊大的“美国主义”,而这必将使美国走上下坡路。

布鲁姆的话在21世纪逐渐成为现实。当前,美国经济虽已逐渐复苏,但仍面临诸多危机,而这些危机,如同雅克所说,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朝一夕难以解决;与此同时,中国却依然保持着高位的经济增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大势所趋,而且这一刻很快就要到来。雅克警醒他们说,中国取代美国,对于西方也是走出无知,重新认识自己和其他文明的好机遇。

在书中,他特别赞赏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并把它看做中国的软实力。而在2010年2月,文汇报“文汇报学人”周刊,记者田晓玲对他的采访中,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有强大的软实力,在于其拥有强大的财力来吸引人才,而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必须学会接受自己力量下滑的现实。而他使用“统治”一词来做书名,并不是说已经发生的现实,而是说中国将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虽然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一转变,但全球格局将不再是单极的,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新霸权,而是说,中国很重要,美国也很重要。在2012年的伦敦书展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上,他重申,必须通过过去来理解中国的未来,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将会与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非常不同。

夏威夷大学教授汉学家安乐哲曾经指出,西方人在研究中国,或者当代中国人研究中国时,难免会陷于用西方的理论工具来套用中国的困境。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自贬,对于西方人来说则是居高临下。不过作为追求平等的知识分子,雅克并没有这样的居高临下,他尝试着摆脱这一困境,他把中国式的价值视为与西方价值平等的文明,而且他还指出,中药和中餐的流行恰恰表明,西方人对于中国价值的认同是可能的。

偏见的形成非一日之效,打破也非一日之功。为此,马丁·雅克愿意为此不断“言说”。

在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对马丁·雅克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虽然世界环境一直在变,他的思想也一直在变,但他仍然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他的立场始终都是左派的。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左派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之前那么狭隘,但左派追求公正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立场,在雅克身上向来都是体现得很充分的。哲学家萨特曾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他们的任务是观察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并自由地符合良心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从这点来说,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的公共生活热情,以及对时政的批判态度,也延续了自18世纪末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

(撰稿 文汇网实习生 谢怡华)